

· 理论探讨 ·

论 气 化 学 说

孟 庆 云

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,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16号, 100700

摘 要 气化学说是以气的运动变化来阐述人体代谢和精气神转化的理论。自《内经》确立气化概念并以升降出入为基本机制以后,刘完素以气化论病机和药性,张元素发挥为气化药性论,李东垣以脾胃为气化中枢,继后孙一奎把气化原动力归于命门,遂使气化理论逐渐完善。气化学说不仅是辨证论治的指规,也是构建中药药理学的理论资源。

关键词 气化学说;中医理论;气化病

气化学说是以气的运动变化来论述人体生命过程的理论。自从《内经》构建其基本理论以来,后世不断发展补充。在晚期汇入《内经》的“七篇大论”中,气化概念更为宽泛,认为宇宙万物“各从其气化也”(《素问·气交变大论》),以气化为一切自然现象的根本特征,升降出入为基本机制;金元时代的刘河间,以气化论病机和药性,张元素也提出了气化药性论,李东垣以脾胃为人体气化中枢,以少阳之气为启动气化之先机,创立脾胃论,为一些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、新方法;明代孙一奎把人身气化的原动力归于命门,创动气命门学说。由是而使气化学说日趋系统完善,成为指导辨证论治的重要理论。

1 气化学说的理论渊源

《内经》气化理论有三个来源:一是关于先秦气论的哲学思想;二是天人相应的观念;三是在此二者理念下对观察和实践资料的整理提升。

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。先秦诸子百家皆言气。《左传》论“六气”,《国语》言天地阴阳之气,气已经是一个涵盖自然、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概念。《管子》的精气根源论,《吕氏春秋》的元气自然论,皆以气为人和万物之本体。自称老子弟子的文子在所著《文子·下德》篇说:“阴阳陶也,万物乘一气而生。”《庄子·知北游》以气的变化论生命的发生:“杂乎芒芴之间而有气,气变而有形,形变而有生。”荀子又进一步发展为:“人有气,有生,有知,亦有义,故为天下贵也。”说人的生命就是由于气而生发,由构成论发展为生成论。

人与天地相应是气化理论的意象依据,也是气化学说阐述的规律之一。远古以降从事农牧业的先民们,观察作物及人的生长,和一年春夏秋冬时序的关系,萌育了“贵时”观念。《易传·象·节卦》有“天地节而四时成”之论,以人与天地同步的生命现象为天人相应的论

据之一,以后进一步发挥为气化感应论,之后的气一元论认为,人与自然皆由气构成的同一性,可以由天地之气应象人体。古人观测到天地之运动是“天左旋,地右动”(《春秋纬·元命苞》),《内经》又以左升右降为宇宙气化的一般规律,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所谓“左右者,阴阳之道路也”论脏腑气化升发则是“肝生于左,肺藏于右”(《素问·刺禁论》),自然界之升降是“清阳为天,浊阴为地”,人体则是“清阳出上窍,浊阴出下窍”。《内经》中还有重要的定则,把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》提出的“亢害承制论”,作为人体自我调节机制,并非来自人体实验,而是从气象的气化规律推演到人体的。

观念可以开发知觉,古人在气化意识的观察中积累了自然与生命的气化现象,例如在一年四季中,人和动植物都有生、长、化、收、藏之化之变。除在归纳中发现联系之外,又从外而推测其内,从内而推远外,即《灵枢·外揣》之“若是则内外相袭,若鼓之应桴,响之应声,影之似形。故远者司外揣内,近者司内揣外。”由以此建立了气化理论的研究方法。

由上述理路、观念和方法论构建起来的气化学说,也必与之相因,气化学说的特色有四:一是重视时间因素,气化是一个过程,渐变为化,剧化为变,在生命世界中,气化的生命过程是不可逆的,故《内经》两次论及“神转不回”;二是气化规律的普适性,认为天人一体皆从气化,例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所论的“形归气,气归精,精归化”既是食物、药物在人体气化的规律,也是人的高级生命活动生长发育的规律,乃至自然界的规律;三是认识方法的惟象的特征,气化理论不是来自解剖的分析,而是依“象”的认知方式推揣而来;四是观察推理始终贯穿着动态观念,以此“气化流行,生生不息”。这也与《易传·系辞》“以动尚其变”和《易纬》“元气变异”的思想相一致。

2 人体气化的过程机制

早在《内经》即已论述了人体气化有“食气化精”和

“形能转化”两种形式。食气化精是人体与外界环境的物质交换,包括饮食的消化、吸收、排泄和气体交换。食物气化过程如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所述:“食气入胃,散精于肝,淫气于筋。食气入胃,浊气归心,淫精于脉。脉气流经,经气归于肺,肺朝百脉,输精于皮毛。毛脉和精,行气于府,府精神明,留于四藏,气归于权衡,权衡以平,气口成寸,以决死生。”其水饮的气化过程是:“饮入于胃,游溢精气,上输于脾。脾气散精,上归于肺,通调水道,下输膀胱。水精四布,五经并行。”气的交换主要以肺吸清呼浊,吐故纳新为主,还要靠肾纳气、肝疏泄,并依赖三焦流行于经脉,方能内充脏腑,外达肌肤,以发挥真气的作用。呼吸把自然界的清气吸入肺,它与饮食所化生的水谷之气相合而积于胸中便是宗气。宗气与人体先天之气结合便是真气。

“食气化精”既化生了营卫之气,又有赖于在营卫循环中各脏腑参与化精。营卫之气皆生于水谷,都在人体中循环。营气出于中焦,“泌其津液,注之于脉,化以为血,以荣四末,内注于五脏六腑”(《灵枢·邪客》)。卫气运行于脉外,温养脏腑组织,有保卫肌表抗御外邪之功能,其运行与昼夜变化及睡眠有关,白昼行于阳人寤,黑夜行于阴人寐。卫入阴,内行五脏,从下焦入,《灵枢·卫气行》篇说:“其始入于阴,常从足少阴注于肾,肾注于心,心注于肺,肺注于肝,肝注于脾,脾复注于肾为周。”卫气行于阳,则是从上焦出,行于体表手足三阳经脉,其功能是“温分肉,充皮肤,肥腠理,司开阖者也”(《灵枢·本脏》)。

在“食气化精”过程中,三焦殊为重要。三焦既是由气化器官构成的通道,又是气化的机制。存在决定认识,对功能的意象是以结构的认知为前提。《内经》没有论及三焦具体结构和对它气化功能认识的方法。《难经·三十一难》阐述为,三焦是指人体食道胃肠等部分及相关生理机能,还对上中下三焦作了具体定位:上焦从心下到胃上口,主水谷入内;中焦在胃中脘,主腐熟水谷;下焦从相当于膀胱上口水平起,泌别清浊后排出浊物。用“三焦”二字为称谓来命名食气化精的腑,渊源甚古。在甲骨文、金文的时代,先民以火烤熟鸟为食,创造了“焦”字,此会意字:上部是“隹”读作 zhui 字,是“鸟”;是象形独体字,不同于“佳”。下部四点为“火”。“焦”字本义是“烫焦”;是烤黄,不是后世所说的烤焦了,如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将烤黄的饭称“焦饭”。“三焦”以烤熟食物的三种火候来说明上中下各焦,通过不同的工作形式消化食物,消化道在不同时间充盈不同,故而三焦“有名而无定形”。《内经》明确指出三焦是主持诸气,疏通水道的腑,关系着整个人体的气化功能。

气化的另一种形式是“形能读作 tai 转化”,即精、气、神三者之间的转化,是生命活动的高级形式。“形”是看得见摸得着能感知的存在实体,是由作为物质基础的“精”由“气”变化而来。《灵枢·本神》篇说:“故生之来谓之精。”指出“精”是禀于先天的物质。《内经》以“阳化气,阴成形”为概括形能转化的总纲。化精是精充养于后天的过程。和“精”相对而言,言“气”则侧重于活动动力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指出:“精”与“气”之间,既有“气归精”、“精化气”的互生关系,又有“精食气”和“气伤精”的耗竭。“气归精”充实了机体的营养物质,“精化气”使物质转化为动力。“精”和“气”都可以转化为“神”,《灵枢·本神》说:“两精相搏谓之神”;《灵枢·平人绝谷》又说:“神者,水谷之精气也”,都说明神和精气之间也转化,物质可转化为精神。神也可转化成精,如《灵枢·决气》说:“两神相搏,合而成形,常先身生,是谓精。”是精神转化为物质。以上食气化精和形能转化二者,既是气化的两种不同形式,又是气化的两个阶段,二者的统一,是生命气化的全过程。

《内经》的“七篇大论”依据“肇基化元”的气一元论,论述了宇宙万物的五运和六气两大气化系统:五运气化是循一年季节演进时序的气化,座标是地日关系;六气气化是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模式的气化,以三阴三阳来表述,机原在于空间因素,座标是月地关系的十二地支。^[2]其五运的气化内容,远比《内经》其他论篇的五脏气化更为丰富和深入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把五脏气化和六气气化的关系结合起来,以气化之机论述疾病之微兆,即著名的“病机十九条”。

气化的形式和机制是升降出入。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》说:“是以升降出入,无器不有”;“无不出入,无不升降”。其方式是“升已而降,降者谓天;降已而升,升者谓地。天气下降,气流于地,地气上升,气腾于天。故高下相召,升降相因而变作矣。”在天地间,气机升降形成了气候变化:地气上升为云,天气下降为雨。在人体各脏腑之气机是,脾阳主升清,胃阴主降浊,肝阳主升发,肺阴主肃降,肾阳主升腾,肾阴主降敛。气机的内外交换是出入。升降出入是《周易·泰卦》交泰的发挥,主旨是开放。《内经》把人作为自然界中的开放体,是耗散结构的思想,科学地论述了生命物质的特征。

气的哲学理论在北宋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,当时的思想家都以气为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,承认气具有阴阳对立的属性。张载以气为宇宙的本体,认为理是气聚散变化即气化的规律。而程颢、程颐则认为理是本体,有理则有气,“万物之始,气化而已”。在宋代气论的影响下,医学家更深入探讨气化的理论,金元时代的

医学大家都曾对气化理论有重大创新。刘完素指人体与外界气化通道之门户为“玄府”,以气化论五运主病和六气主病,著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,他以气化来论说本草药性,并诠释“七方”、“十剂”的机理,惜乎其《素问药注》亡佚,现只能从遗文中略知他的气化药性理论的线索。^③在这一点上,张元素、李东垣与之共鸣,依气化之说,建立了本草学药性理论。李东垣对气化理论的贡献是他认定脾胃为人体气化中枢,并注意少阳春升之气在启动气机的作用,使得很多气化之为病,经过调理脾胃和配用升麻、柴胡等升阳之剂而有突出的疗效,李东垣因此而享“内伤法东垣”之美誉。朱丹溪以“万物同此一气”论人与自然气化的一致性,他在《格致余论·夏日伏因在内论》中指出:“故气开亦开,气浮亦浮,气降亦降,气沉亦沉,人与天地,同一橐籥。”可以从自然之升浮沉降推论人体之升浮沉降。明代的孙一奎以其原气命门学说,把气化的动力归结为命门所藏之原气。^④至此,气化已成为有系统结构、有动力机制的理论:气化的中枢是脾胃,气化的启动在于少阳肝胆,人体与外界气化门户在玄府,气化的动力为命门原气。

3 气化病及其辨证论治

中医学从以气为本的人体观发展到以气化为生命力,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是以气化正常为生理,气化异常为病理。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指出:自然界与人的气化都是“化不可代,时不可违”;气化有自己的规律,时序有自己的节奏,不能代替,不能违背,应该“无代化,无违时,必养必和,待其来复”。《内经》以此建立了气化论疾病观,其论病和养生,都要“各从其气化也。”

按气化论疾病观,气化过度或气化不足,精、气、神转化障碍、升降出入紊乱都可导致疾病,堪称“百病生于气也”(《素问·举痛论》),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说:“生病起于过用”,人体如此,自然界也如是。例如人体五志过激则有七情之变,自然界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气气化太过则为六淫。人体气化不足,在气化中枢的脾胃,则是脾胃虚弱或中气不足,脾胃虚弱用仲景建中法的小建中汤,中气不足用东垣补中益气法的补中益气汤。气化不足如发生在蕴生原气的基地命门,则为命门衰,治当温补命火,填精益肾,在补阴的基础上,略加温阳之品,开启发机,使少火生气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·胡桃》项下,论及了胡桃(核桃仁)能“益命门,利三焦”,明代命门学派的医家已经归纳出补益命门的一类药,如胡桃、鹿茸、紫河车等。饮食代谢异常之病多属气化为病,例如消渴主要是气化能力低下而导致多食。癃闭、关格等病证,皆系三焦气化失常所致。精气神三者的转化障碍,常引起虚证和情志病。例如因脾虚气化功

能低下,不能化精,可发生肾虚精亏。因气化功能低下,不能化水湿而生痰,可发生郁证和癫狂等。

气化的机制是升降出入,其失调则为病变。如肝阳不升则肝气郁结,肺气不降则喘满。脾胃升降失调“清气在下则生飧泄,浊气在上则生䐜胀。”人体吸入清气呼出浊气,三焦的摄入水谷精微、排出糟粕浊物,以及玄府排出汗液和热量才能维持代谢,这些过程失调失控皆能致病,甚至“出入废则神机化灭”。这一点,清人蒋廷秀深得其要,他在《医医汇讲》中称升降出入为“百病之纲领”。

气化的立论及其过程和机制,是中医学理论中称绝之处,在辨证论治时,临床家每能据食气化精、形能转化、营卫水气循环和升降出入之理,创造出工意新奇的治法来。例如孙思邈在《千金方》中用升麻、柴胡升阳,李东垣将其合以补气建中之药,创制了名方补中益气汤。明代张景岳依“气化水自化……不行气亦行”重用行气药以治肿胀。明末清初喻嘉言,以解表合清热利湿导滞,改变了痢疾的升降出入,以逆流挽舟法见称于医林。清代叶天士以“通阳不在温,而在利小便”治疗湿温。近人周雅南以紫菀、桔梗、沙参、石斛等药“提壶揭盖”以治尿闭;用龟甲、何首乌、龙齿、桑椹等固肾之品治久嗽久喘,效如桴鼓。见赵恩俭《疹余集》。著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的张锡纯,以增强肝的气化治疗大气下陷,笔者指出,在治疗泄泻时,用五苓散利小便以实大便,其机制是分流原理对水液循环的调控。^⑤

近年来,已经有运用脾虚^⑥和肾虚动物模型^⑦探讨气化功能。也有研究者试图从肺和经络气化功能探讨针麻原理。虽说未能向纵深发展或有所停顿,但已能展示出理论价值,应予关注和支持。总之,气化学说也约略地提出了人体营养物质和形能转化理论的“总画面”,其论述也并非详尽无遗,尽管如此,它仍不失为中医学之精蕴,有待我们用现代科学方法深入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① 左安民. 细说汉字.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05: 536
② 孟庆云. 五运六气: 中国古代的灾害预测学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 2005, ②: 81~ 83
③ 范行准. 中国医学史略.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1986: 170
④ 孟庆云. 命门学说的理论来源与实践价值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 2006, ⑦: 483~ 485
⑤ 孟庆云. 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控制艺术. 辽宁中医杂志, 1980, (11): 3~ 5
⑥ 孙弼纲. 从脾胃内伤学说探讨中医脾实质. 安徽医学, 1984, ⑤: 1
⑦ 沈自尹. 肾的研究进展与总结. 中国医药学报, 1988, ②: 56